



中越文化交流论

李未醉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越文化交流论

李朱醉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越文化交流论 / 李未醉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4

(鹅湖学术文丛)

ISBN 978-7-80206-564-2

I. 中… II. 李… III. 中越关系—文化交流—研究

IV. G125 G13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1145 号

鹅湖学术文丛·中越文化交流论

著 者: 李未醉

责任编辑: 茹新平

版式设计: 莘海琴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4

传 真: 010-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460 千字 **印 张:** 98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564-2

定 价: 280.00 元/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鹅湖学术文丛》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汤一介	李学勤	张立文
	陈 来	姜广辉	蔡仁厚

主 任	柳和生		
副主任	吴长庚		
委 员	郑日金	邹 毅	赖明谷
	吴晓东	揭新华	范安平
	汪继南	谢维营	曹南洋
	张一兵		

主 编	吴长庚		
副主编	谢维营	范安平	
编 委	李未醉	张小丽	苏 敏

总 序

八百年前,为了调和朱陆学术异同,吕祖谦曾邀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论辩于信州铅山之鹅湖寺,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自由论辩、平等交流的典范,它揭开了朱陆学术异同之争的历史序幕,也引发了近三百年朱子学与江西之学的交流与论争。鹅湖之会又一次深刻自我反思、彼此汇纳吸收的盛会。会议后,朱陆双方对来自对方的批评意见都进行了深刻反思,都作了自我批评,推进了学术的发展。鹅湖之会所展示的学术精神,值得后人借鉴并发扬光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二届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上饶师专就以派出五人团队、提交七十五万字论文而备受与会学者的关注。会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宣民先生等专程到学校考察,双方签订了人才培养及共同创办《朱子学刊》的协议,学校的国学研究之火,很快被点燃起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学校已在专科基础上发展成为拥有约一万二千名全日制学生的地方本科大学,师资结构不断改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以朱子学研究为基础的国学研究已



成为我院学术研究的特色,得到很大发展。这套《鹅湖学术文丛》的编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来的。

丛书以“鹅湖”为称,有以下考虑:其一,鹅湖就在上饶辖下之铅山县,历史上的朱陆鹅湖之会即发生在境内之鹅湖寺,鹅湖实涵禅儒二宗,重修的鹅湖书院是我院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实践基地,距上饶师院不过半小时车程;其二,丛书的编纂,旨在弘扬鹅湖之会所展示的学术精神,总结数百年江西理学传承兴衰的经验,正确评价和认识江西理学在中国理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其三,愿以鹅湖学术精神引领我院学科之路,山不辞土石,海不捐细流,交流论辩,汇纳吸收,正是我们学术成长的基本道路。

本丛书一套八册,都是近几年我院学者的心血之作。2005年,我院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随后一年的整改过程中,我们迅速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基点上。经过几年的积累,朱子学研究所成功申报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成功申报为江西省高校重点学科。学科群体的结合和学科方向的凝练,为我院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结合了地方历史文化,逐渐形成明显的学科特色。

以朱子学研究为基础的国学研究,是本丛书内容的核心。吴长庚教授的《延陵堂儒学论集》和《延陵堂文学论集》是他近三十年来发表的儒学及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的选编。冯会明副教授的《胡居仁与余干之学》,则是近几年江西理学研究的新成果,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胡居仁理学的专著。周茶仙副教授的《朱熹经济思想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考察朱熹的经济思想,可为当代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张小丽博士的《宋代咏史诗研究》以断代古典咏史诗为对象,探讨了诗人的生平经历、时代思潮与中国古典咏史诗美学特征形成的关系。李未醉博士的《中越文化交流论》,较多地考察了传统儒释道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汲军教授的《辛弃疾信州词与信州生活》,则更

多发掘地方历史文献,考察辛弃疾与信州文人集团的交往及其经济生活,从而为其后期词风的形成提出意见。徐润润教授的《现代诗学原理新论》,上篇讨论了一体两翼的诗歌本质论,下篇从批评和鉴赏角度分析了一些作家的个案。

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一扇窗口,展示我院这所地方大学的学者潜心向学的精神和苦心耕耘的成果。书写出来自然希望有人来读,更欢迎有人去评,有人去辨。因为理不辨不明,学不争不精,鹅湖学术精神是始终与论辩结合在一起的。期待学术界批评指正。

柳和生 己丑仲春 于上饶师范学院

序 一

越南是我国的亲密邻邦，两国山水相连，两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和人民之间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的经济文化相互交流，彼此促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向互相同情，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研究中越文化交流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越文化交流并非新的课题，国内外史学界已有多项论著问世，但全面系统的研究著述并不多见。未醉教授不畏艰辛，广泛搜集资料，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反复不断地修改更新，撰写了这部从古至今的中越文化交流史。本书不仅论及了古代，还一直阐述到近现代，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越文化交流史著作。未醉的这部力作，对我颇有启示。

自古以来，在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水平上，中国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因而与中国邻近的东亚诸国均先后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影响。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华夏文明不但滋养着本国的亿万人民，也传播到和影响东亚的友邻诸国。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包括对越南的文化辐射与交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位于中国南面的越南在中国文化辐射的第一圈内。历史上，以中日朝(韩)越诸国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圈，又称为“汉文化圈”，



是以儒学为重心的,稍后以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和中国的道教哲学,即儒释道文化为核心文化。这种文化早就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时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越南曾有巨大影响。有的学者说:“昔之四裔漫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①且认为,“在环绕中国的邻邦中,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体的,首推越南”^②。

2. 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还有多种民间的交往。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既有互派使节、经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文学艺术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等。其中,“朝贡贸易”和民间交易形式下的经贸来往与宗教的交流,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历史资料表明,中外关系的起始,首先是人民之间的互相接触,而官方的联系,邦交的建立,往往是在民间往来之后。因此,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既要重视官方上层的联系,又不可忽视研究民间的交往。邦交的建立,国家关系的发展,往往更有利于人民之间的往来。然而,人民之间的来往又常常是国家关系建立的先导。当国家关系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阻时,民间的经贸文化并没有停止。

研究中外关系史,包括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轨迹:人民群众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经济文化的交流——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人民交往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民间先行、国家主导、官民并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而华人华侨在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历史上先后有许多中国人南迁东南亚。中国移民是在东南亚传播中国

① 冯承钧:“占婆史译序”,载马司帛洛:《占婆史》,中译本,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② 郭廷以:“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载《中越文化论集》(一),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6年版,第1页。

文化的使者与桥梁,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

3. 和平的非暴力的交流是发展的主流。在我国与越南和东南亚的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无疑是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历史上曾有封建统治者,发动过相互间的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2000 多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交往为重点的历史,其基本理念是“和而贵”,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从来是开放的、宽容的,这是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方面。

中越两国在历史上虽发生过冲突与战争,但具体分析起来,中越两国间的战争年代加在一起是很短暂的。自越南建立封建国家以后,历经丁、前黎、李、陈、胡、后黎,直到阮朝,共约 1000 多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大约只有 20 年,而且每次战争结束后,两国王朝都采取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可见,在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而两国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比起其它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

4. 突出地表现为交流的双向互动性。在中国与越南和东南亚文化交流史上,相互促进构成了重要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历史影响与促进作用,这两个方面也不可偏废。

越南与中国的联系异常密切,郡县时期汉文化的传播为越南进入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在文化传承上,独立自主的越南归属于东亚文化系统,与属于印度文化圈的其他古代东南亚国家有所区别。但在中越文化关系发展的长河中,中越之间文化交流也是双向、互补



的。中国文化在输出的同时,也从越南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有益的因素。在物质文化方面,越南的一些优良品种的输入对中国品种的改良甚有助益。例如,槟榔、荔枝、婆罗密、龙眼等热带花果树种是从越南引进的,而越南(交趾地区)出产的蔗糖产量高与质量优于中国。《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其汁,曝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偈之石密。”^①三国东吴时,石密即交趾的蔗糖传入中国,改善了中国的甘蔗品种。

占婆王国是位于今越南中部的一个古国,盛产的稻谷,比中国稻“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占城稻的优点是成熟期短,仅60天左右,而产量较高,受中国南方农民欢迎。

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讲,应特别注意研究和正确反映中国在东亚与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起始、经过隋唐到明清,两千多年,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规模日益扩大。例如,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大高潮。郑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带到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刺激了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

由此可见,一部中国与越南文化交流史,是两国人民的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未醉的这部书贯穿了这个基本脉络。

我与未醉教授并非同乡,也未在同一学校工作,是科研的兴趣与缘分把我们联系起来的。他先后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分别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① 嵇含:《南方草木状》。

他出版过两部学术专著，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主持完成江西省社会规划项目课题二项。在我国中外关系史、华侨华人学术研究领域内未醉教授是颇有建树的中青年骨干。

近年来，为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未醉教授埋头书案，数易其稿，终于撰成了这部中越文化交流史，其笔耕不止和奋力攀登的精神与勇气令人赞佩。当我读完这部 20 多万字的文稿后，唯有勉力完成这篇短文，谈几点认识，以表祝贺，愿此一著作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对周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并促进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是为序。

梁志明

2008 年 11 月 2 日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越南史和东南亚史研究。）

序 二

未醉近告，他将有新著问世。乍听之，一则固然是喜，二则亦有所忧。

所喜者，是因为未醉治学之勤，成果出炉之速，我早有印象，他的师兄弟妹们与同行们也早有共识。每当读到其新著，他们均竖指称赞，好评如潮。这倒不全归因于未醉为江西省高校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科研骨干，应有比别人多且优质的成果“产出”。更主要的是，自他过去求学，到今日为人师表，十数年来，已经形成了刻苦勤勉、矢志以行的治学风范与攻关习惯，再加上他后生可畏，思维敏捷，下笔不俗。因此，若然他在一段时期内没有新的著述问世，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果然，是次未醉又不负众望，推出新著，证明未醉不愧为未醉，初生之犊，前程未可限量也。

所忧者有二。一是忧他经年伏案劳累，体力过耗，精神透支，为长久治学之忌；二是忧他所执教的学校，并非全国入流之名校，在目下某种过于偏执地看重“商标”或“品牌”而疏于细审内容精芜、过于仰视名家名门而轻看“成龙”中的青年才俊的世俗氛围下，未醉勤于著述，或未必轻易博得所有人的赞誉。未醉几年间便在自己的学术梯级上连连进取，旁人看来，已经到达“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



境界。他已走完了一般学人需双倍乃至数倍时间才可能走完的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迭出新著,会不会造成别人的不解,甚至忌眼、白眼与冷眼?

事实证明,我的后一“忧”实属多余。粗略读罢未醉此书,便觉得,作为一名学人,对于世间尘埃雾霭、俗浪腥风,实在没有过多考虑的必要,也不应任其自乱方寸。作为一名在某一领域扛旗的学术带头人,恪守其学术责任与学人良知,多出成果,多出精品,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点上,未醉应已具备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治学胸量,当也深谙“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见金”的学术意蕴。由是窃思,对于一个学人来说,除了应有严谨、细腻的治学技巧之外,具备勇于进取、敢于挑战的学术朝气和锐气,也是不可或缺的。

粗览未醉此书,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姑书之于下,与识者分享,也供读者参考。

首先,是它的全面性与系统性。顾名思义,未醉此著既然属“中越文化交流史”,就必须符合这类著述的一般“属性”,也就是说,内容要博,或曰全面,同时要有系统。全面的要求是,举凡属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内容,应该做到捡拾无遗,详尽备细,不应轻易遗漏。最重要的是,既要注意搜猎前人现有的研究成果,也要着力搜猎前人尚未涉及的原始材料,并据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系统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属于这个领域的全部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编排,使之逻辑有序,详略得当。而所谓详略得当,实际上也包含有对某些内容进行合理删削的含义。这些要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非易事。除了研究者具备必需的学识外,更需有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态度和耐力。这是基本功,更是学养。

由此书的写作看来,未醉是尽了大力的。一者,此书对研究领域进行了合理的拓展。此书的首要关键词是文化。众所周知,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作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广义的文化是指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成就。狭义的

文化是指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和宗教等主要与精神文明相关的东西,或曰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狭义的文化。不难发现,以前对文化交流的论述往往多从狭义出发,而未醉对中越文化交流的理解则是基于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制度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本书所论述的文化交流,是指中越两国民间和官方在物质、精神和制度方面所进行的广泛交流。因而,此书所说的两国文化交流就显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作者同时还认为,相互学习、互相影响、通力合作等等,都是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形式。二者,全书除了广泛引用前人所用的材料外,还注重使用中国古代载籍中的资料,运用本人和他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未醉个人对中越音乐交流、中越医药交流的研究,是前人所未予专注的,此书将之揽入其中。另外,华侨华人在中越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的作用,自古至今,一以贯之。未醉在论著第二至第五章中也有专题论述之。

其次,此书的视野更加归一和集中。在前人的研究中,虽不乏关于中越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但往往将之放在一个更加宽泛的“板块”(例如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中进行叙述。未醉此书则为中越文化交流史开专柜,称得上首部全面专门论述中越文化交流史的著作。

再者,不应忽略未醉在此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颖观点,特别是一些宏观的深刻见解。例如,作者认为,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规模、质量等方面受政治关系的影响很大。从古代到现代,中越两国之间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战争。战争对两国人民来说是不幸的。一般来说,人们也普遍认为战争对两国文化交流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甚至起阻滞作用。但未醉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战争不仅没有隔断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反而成为文化交流的渠道之一。实际上,这种看法更多地表现出他具有较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素养。他还认为,民间文化交流是广大人民的愿望,民间文化交流历来呈现勃勃生机。民间文化交流与官方文化交流互相促进,民间文化交流有助于官方文化交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些见解颇具新意。



在写作体裁上,不妨将未醉此书视为一部“类纪事本末体”著作看待。它将“文化类别”和“编年”两方面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历史事实在一个“横”与“纵”并具的坐标中有科学合适的“定位”,方便了阅读和检索者,也方便人们进行前后左右上下的立体比较分析。在此书中,先分古、近、现代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在每个大阶段中,先有“文化类别”的划分;在每一“文化类别”之下,再进行内容的编年。这种写法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因而使此书也具有某种“准工具书”的属性。当然,在全书所引用的史料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地方分析得较为详尽深刻,有的地方则可能较为粗略,就见仁见智了。读者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就其中某个或某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实际上,旁人若能从未醉此书中得到某种启发和感悟,因而以此为起点,萌生出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做出新的成就,或也算是未醉的另一类贡献吧。所谓“抛砖引玉”,此之谓也。

本书固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以为越文资料相对缺乏,如能增添若干越方史料,则著作更为充实。

所有在学术领域做出新贡献的学人都是值得赞扬的,此书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对此表示祝贺,并期待未醉写出更好的著作。

高伟浓

2009年3月24日

(作者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与华人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古代越南曾经长期处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深受中国的影响,公元10世纪越南建国后,与中国仍然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文化交流频繁。自法国把越南变为殖民地后,中越两国的来往受到重重阻碍,但是中越两国的爱国人士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民国时期,中越两国革命者互相帮助,友谊日益加深。新中国诞生后,两国于1950年1月18日建立邦交,中越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1950—1975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越两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互相支持,密切合作,从而使睦邻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

越南南北统一后,与中国的关系一度经历了曲折,1979年发生边境战争,两国文化交流受到严重影响。但自1991年11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又重新发展起来,相互信赖逐步增进。当前,中越两国已建立了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了睦邻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和好同志。